

海外遺民 竟不歸

——明遺民東渡研究

韦祖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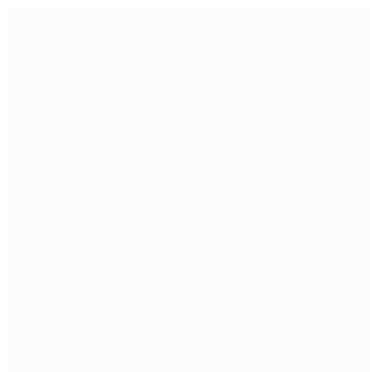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外遗民竟不归

——明遗民东渡研究

韦祖辉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 / 韦祖辉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4687-6

I . ①海… II . ①韦… III .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2494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海外遗民竟不归

——明遗民东渡研究

韦祖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4687 - 6

2017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38.00元

自序

东渡日本的明遗民，多才多艺，他们推动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明遗民东渡日本的问题，日本保存的资料最为丰富，日本学者论述比较多，但除中村久四郎在《史学杂志》上发表的《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势力和影响》比较全面、详细外，其他都过于简要，专题探讨性著作更为少见。我国这方面的资料甚少，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也撰写过文章，但大多局限在几个人物的事迹上。那么，我是怎样撰写这本书的呢？

此事要追忆到谢国桢先生逝世后不久，即1982年深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接到我驻日大使符浩先生签署使馆转来名古屋市张礼吉先生信，询问其始祖张振甫为崇祯太子的说法能否成立。历史所原明史室副主任刘重日先生授权我回复，我在查阅资料基础上，写出书面否定性意见。此事使我对明遗民东渡日本的课题产生了兴趣。日本名古屋市张礼吉先生函询的问题，是日本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疑案。据1938年3月2日名古屋消息，“日本贵族院议员赤池浓氏曾查得中国明朝亡国后有王子东奔日本，受德川四代将军家纲的庇护，改姓张氏，任为尾张藩御典医官，并特准骑马登城。更赐给名古屋市千种

区锅屋町之墓地，子孙辈辈仕尾张藩”^①，此“改姓张氏”、“任为尾张藩御典医官”的“王子”，即指张礼吉先生始祖张振甫。1984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徐尧辉先生专著《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系统论证张振甫就是崇祯太子朱慈烺，似乎解决了搁置多年的悬案。但是，后来我有机会拜读了该书，认为徐尧辉先生论点颇难成立，遂写质疑性文章，并在台湾学术刊物发表。

多年来，我研究明遗民东渡日本的课题，相继写成《明遗民东渡述略》（《明史研究论丛》1985年第3辑）、《高寿觉寓日归明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献疑》（台湾《历史月刊》1988年第3期）、《朱舜水思想剖析》（《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第5辑）、《朱舜水与日本德川时代惺窝学派分化》（《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隐元与日本黄檗宗》（1995年陈智超、韦祖辉、何龄修编《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附录）、《明清社会变动和明遗民东渡日本》（《清史论丛》1995年）、《日本应郑成功请求大举出兵新证》（《明史论丛》1997年），以上工作为撰写本书奠定了基础。应该指出，我的同事陈智超兄为了编排曹洞宗旅日高僧心越诗文集，1993年在宇治万福寺看到中土僧、俗致隐元书信原件。翌年由他领头、我与何龄修兄参加，共同对隐元收到的百余通书信影印件逐一整理注释，这使我获益匪浅，并为本书充实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史料。还应该指出，我的同事、原明史室副主任王春瑜兄很重视这个课题，给予我不少帮助和鼓励，在他督策下撰写此书，取名为《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

① 见《日本研究》1945年第4卷第4期彭鉴《二千年来中国遗民归化日本者之一考察》文内援引之资料。

明遗民东渡日本，为何能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呢？实际上这是关系到明代政治、文化的大问题，本书不惜笔墨分析有明一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意在论证明遗民多闻博学，其精神文化素质形成不是偶然的。明遗民问题，也是南明史研究一大课题，本书结合南明历史不同时期背景，揭示明遗民东渡前期、高潮、低潮三个时期特点，意在说明这是明清鼎革之际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①，本书力图说明他们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使者，传播明代中国文化，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舛误之处，企盼斧正。

2011年夏天记于北京亚运村

①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目 录

第一编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和东渡日本的桥梁

第一章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的形成.....	3
第一节 明初鼎盛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	3
第二节 明中衰时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	10
第三节 明极衰时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	15
第四节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	20
第二章 明遗民东渡日本的桥梁.....	26
第一节 明代中日关系	26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的桥梁	34

第二编 明遗民东渡日本

第一章 “天远海空阔，人在一浮桴”

——明遗民东渡日本前期（1644—1650年）	41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41
----------	----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情况	46
---------------	----

第二章 “任浮沧海去，心事付东流”

——明遗民东渡日本高潮期（1651—1661年）	60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60
----------	----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情况	65
---------------	----

第三节 代表人物	81
----------	----

第三章 “大海无边圻，扁舟何处收”

——明遗民东渡日本低潮期（1662—1683年）	99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99
----------	----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情况	103
---------------	-----

第三节 代表人物	123
----------	-----

第三编 明遗民对日本精神文化影响

第一章 朱舜水对日本学术思想影响.....	137
第一节 朱舜水学术思想	137
第二节 从藤原惺窝到朱舜水看德川幕府时期 学术思想变化	151
第二章 明遗民对日本佛教影响.....	170
第一节 明遗民东渡前日本临济宗、曹洞宗状况	170
第二节 “广集龙象，大振纲宗”	173
第三节 “只将一滴曹源水，随处为霖遍刹尘”	195
第三章 明遗民对日本医药学发展影响.....	209
第一节 戴曼公、化林性英与日本医学	210
第二节 明遗民与日本本草学	219
第四章 明遗民对日本艺术发展影响.....	227
第一节 明遗民与日本书法、绘画艺术	228

第二节 明遗民与日本园林建筑	242
第三节 其他	249
附 录	268
高寿觉寓日归明考	268
《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献疑	273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292

第一编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和东渡日本的桥梁

明遗民继承了其前辈的实学思潮，批判程朱传注，博学多闻，是明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结晶。浙江宁波、福建厦门等港口和日本长崎，是明遗民东渡日本的桥梁。

第一章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的形成

所谓明遗民，是指自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至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统一台湾时期内，忠于明室的有文化修养的缙绅士大夫。这个阶层的出现，乃是明清动荡之际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明遗民多才多艺，他们对清初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亡命日本，对日本人民精神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产生的影响力之大小，是由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高低所决定的。可见，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它是有明一代固有的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结晶，与明王朝的盛衰和明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明初鼎盛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抱济世安民之志，创立法度，注重农桑，经明成祖朱棣继承，及至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休养生息，这一时期（1368—1435年）国势鼎盛，仓廪赡足，生齿繁殖，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为了与当时政

治、经济发展相适应，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注意制科取士。但一直被史学界忽视的是，洪武与永乐时期文化教育的内容是有差异的。

朱元璋称帝后注重收藏、阅读经史书籍，注重教育皇室成员，故“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①，“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图书。……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分番夜直”^②。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③，所以他十分重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当时学校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此外还有社学、私塾等。各类学校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洪武时代儒臣，如刘基、宋濂、叶琛、章溢、汪克宽、朱升、詹同、徐一夔、梁寅、刘三吾等人，都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人才，大多是朱熹学派传人，受到朱元璋重用。朱元璋对待经书可贵之处在于，他既看重汉唐以来古注疏，又没有片面推崇宋代程颐、朱熹传注，因此当时程朱理学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如洪武三年（1370）开设科举，公布由朱元璋、刘基制定的《科举条例》，明确规定考试五经，“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④，各试本经一道，都保留古注疏，不偏重程朱传注，即：

《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四书义一道。^⑤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

② 郑晓：《今言》331条。

③ 《明史》卷69《选举志一》。

④ 《明史》卷70《选举志二》。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命礼部颁行《科举条例》，仍然明确“五经皆主古注疏，不专宋儒”^①，此即后代人所说：“国初，朱注与古注疏同颁学宫，未尝定为一说”^②，这是有利于当时经学继续发展。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觉察到朱熹门人蔡沈《书集传》有误，就命刘三吾等人校订，书成《书传会选》。当时类似成果甚多，如朱升《周易旁注图说》、朱善《诗解颐》、张以宁《胡传辨疑》、石光霁《春秋钩元》、项震《孝经述注》、蒋悌生《五经蠡测》、史伯璿《四书管窥》等学术著作就是例证。洪武时文化教育就在这一大背景下起步并健康发展起来，诚如《明史》卷 69《选举志一》所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洪武时文学艺术成就，有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长篇章回体小说，书法以宋克、宋璲、宋广最为著名，尤以宋克成就最高，开明代真、草书法艺术风气之先。

进入永乐年代，洪武耆儒饱学者大多丧亡，朱棣称帝后并非缺乏经学人才。如解缙幼年颖敏，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九岁举进士，授庶吉士，上书万言对学术发展提出具体建议，建文帝时代为翰林待诏，“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③。奇怪的是解缙在永乐年代官至侍读学士，却在经学方面没有任何作为，这是因为永乐时代文化教育“靖难”政治色彩极浓。朱棣“靖难”举兵，血腥杀害建文皇帝臣僚及其家属，少者一族，多者三族、五族，受戮最惨烈的是方孝孺，株连其亲友近九百人，即所谓“十族诛”。这是史无前例的暴行，引起

① 谈迁：《国榷》卷 8。

② 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 3《注疏》。

③ 《明史》卷 147《解缙传》。

平民百姓的强烈不满。建文四年（1402）七月初一日，朱棣即位颁诏革除建文年号，是以：

漳州府教授茂名陈思贤闻诏至，曰：“明伦正在今日”，率诸生伍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为旧君位，哭临如仪。郡人执思贤入京，死之。诸生皆以身殉国。^①

漳州府学陈思贤教授率诸生“明伦”，谴责朱棣灭人伦，痛切追悼建文帝，这是朱棣称帝后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直接危及朱棣的统治地位。故朱棣对陈思贤等师生采用镇压手段后，为了掩盖其弑帝的叛逆行径，他称帝后立即删改《太祖实录》，废弃经书详于度数和考证的汉唐古注疏，独尊强调义理的宋儒程朱传注，以束缚诸生独立思考能力，来巩固永乐政权所谓的“合法性”。因此永乐元年（1403）八月乡试、永乐二年（1404）二月会试，五经试题都是废弃古注疏而独主程朱传注，并于永乐二年二月修改国子监洪武时代不主张程朱传注的经书印版^②。朱棣此举，遭到学者反对。永乐二年七月，“鄱阳儒士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毁濂、洛、关、闽之说。上曰：‘此儒贼也’，焚其书，罪之”^③。朱棣此举，实际是为后来成书《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奠定了基调。

严格来说，永乐与洪武年间文化教育内容的差异，是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书为分界线的。翰林院学士胡广及侍讲杨荣、金幼孜根据明成祖朱棣旨意，于永乐十三年（1415）编成《四书大全》、

^① 谈迁：《国榷》卷 12。

^② 参见谈迁：《国榷》卷 13。

^③ 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 3。

《五经大全》。《明史》说：“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①四书本来是朱熹首定书名，永乐与洪武时代不同，宋、元以来诸多阐述四书经义书籍均废弃掉了，胡广等人根据元代学宗、朱熹五传弟子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剽窃成《四书大全》，成为永乐以后明朝历代“取士之制者也”^②。所谓《五经大全》，是《春秋大全》、《诗经大全》、《礼记大全》、《周易大全》、《书传大全》合称。《五经大全》废弃古注疏，取代洪武年间五经，这是明代文化教育史上的大退步，也导致了明代科举考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退步。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洪武时《春秋》，除有《左传》、《公羊》、《穀梁》，还有郑玄、杜预、陆淳等古注疏，还有宋代程颐传人胡安国《春秋传》、朱熹传人张洽《春秋集注》，均成为当时科举考试《春秋》的内容依据。元末汪克宽根据胡安国《春秋传》编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入明后参修《元史》，死于洪武五年（1372）。没有想到，胡广等人名为纂修，实际是完全抄袭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编成《春秋大全》。《春秋大全》废掉古注疏，所采诸说完全根据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中胡安国传注定夺，而不考论其是非，张洽《春秋集注》遂废而不用。所以，永乐以后明朝历代科举考试以《春秋》经文命题，实际是以胡安国传注立义，“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③。

第二，洪武时《诗经》，汉、唐以来有毛亨、郑玄、陆玑、孔颖达等人注疏，宋代朱熹《诗集传》都被朱元璋采用，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依据。本来，元代刘瑾根据朱熹《诗集传》撰成《诗传通

① 《明史》卷 70《选举志二》。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 36《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 28《经部·春秋类三·春秋大全》提要。